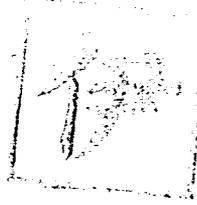


民國二十三年十二月十三日出版

日本研究會小叢書

第七十七種

日本近世文化與中國



論社通管部

沈觀鼎先生著
教育部審定

增修
補正

東
文
新
教
程

此書係外交部亞洲司沈司長新著內容豐富
新穎實用洵學習日本文言之津梁也寄售處
商務印書館民智書局開明書店內山書店等

日本研究會小叢書

第七十七種

日本近世文化與中國

日本評論社主編
正中書局發行

國立編譯館
登錄證
5 199 7781

本叢書已出版七十七種

- | | | | | | |
|-------|--------------|-------|-------------|--------|-------------|
| 第一種 | 日本的軍費膨脹與財政危機 | 第廿七種 | 日本政治之今昔 | 第廿五十三種 | 日本國民的信仰生活 |
| 第二種 | 日本國際貿易之分析 | 第廿八種 | 日本之米穀統制 | 第廿五十四種 | 日本之大陸侵略政策 |
| 第三種 | 日本財政制度 | 第廿九種 | 日本之水產業 | 第廿五十五種 | 日本蠶絲業之概況 |
| 第四種 | 日本共產黨之發展 | 第卅種 | 日本之固有產業 | 第廿五十六種 | 日本的經濟區域 |
| 第五種 | 日本法西斯運動之展望 | 第卅一種 | 日本對世界戰爭之準備 | 第廿五十七種 | 日本的政黨 |
| 第六種 | 最近日本之軍備概況 | 第卅二種 | 抵制日貨之考察 | 第廿五十八種 | 暴日侵華政策之新階級 |
| 第七種 | 中日關稅協定問題 | 第卅三種 | 英文現代日本名人索引 | 第廿五十九種 | 日本之青年團 |
| 第八種 | 日俄中東路衝突之真相 | 第卅四種 | 日本殖民地之政治制度 | 第卅種 | 日本美術演進小史 |
| 第九種 | 從國際經濟觀察中日關係 | 第卅五種 | 日本之東亞門羅主義 | 第卅一種 | 藏本失縱事件之始末 |
| 第十種 | 日本之合作運動 | 第卅六種 | 日本之關稅政策 | 第卅二種 | 日本的動力 |
| 第十一種 | 日本陸軍的統帥與編制 | 第卅七種 | 日本軍事公債論 | 第卅三種 | 日本的交通事業 |
| 第十二種 | 日本財政史要 | 第卅八種 | 日本國民性 | 第卅四種 | 日本考古學之過去與現在 |
| 第十三種 | 日本蠶絲之統制 | 第卅九種 | 日本制憲史 | 第卅五種 | 日本之南洋委託治理地 |
| 第十四種 | 日本之工業 | 第四十種 | 英文日本地名索引 | 第卅六種 | 近卅年之日本文藝界 |
| 第十五種 | 九一八以後我國之損失 | 第四十一種 | 日本人文地理之特徵 | 第卅七種 | 新稅率與日貨 |
| 第十六種 | 日本之國際貨幣關係 | 第四十二種 | 日本的海軍 | 第卅八種 | 中日通商條約問題 |
| 第十七種 | 日本金融恐慌的新局面 | 第四十三種 | 東北與白俄 | 第卅九種 | 九一八事變之回顧 |
| 第十八種 | 日本之農業 | 第四十四種 | 日本之通貨膨脹 | 第四十種 | 日人統治下之朝鮮 |
| 第十九種 | 日本銀行制度 | 第四十五種 | 日俄外交之回顧 | 第四十一種 | 日英同盟之始末 |
| 第二十種 | 日本之勞工運動 | 第四十六種 | 日本產業之現狀 | 第四十二種 | 日本的婦女運動 |
| 第二十一種 | 日本之地方財政 | 第四十七種 | 日本人口之豫測 | 第四十三種 | 一九三六年與日美海軍 |
| 第二十二種 | 日本之農民運動 | 第四十八種 | 日本之入種 | 第四十四種 | 日本軍部之國防論 |
| 第二十三種 | 日本軍事經濟統制 | 第四十九種 | 日本在太平洋上之經濟戰 | 第四十五種 | 日本之青年訓練所 |
| 第二十四種 | 日本戰爭總動員之準備 | 第五十種 | 日本現代人物小傳(一) | 第四十六種 | 日本現代人物小傳(二) |
| 第二十五種 | 日本之化學工業 | 第五十一種 | 日本國民經濟發展概況 | 第七十七種 | 日本近世文化與中國 |
| 第二十六種 | 留日華僑概況 | 第五十二種 | 日本之礦業 | | |

731.808

461

:77.1

目錄

第一章	序論
第二章	本論
第一節	儒學——特別關於考證學風
第二節	史學
第三節	文學
第四節	文字語言學及「唐音清語」
第五節	美術
第一	繪畫
第二	書
第三	文房具其他

第六節 宗教

第七節 醫術及博物學附理化等科學

第一 醫術

第二 博物學附理化等科學

第八節 由漢籍所得的西洋新智識

第九節 政治法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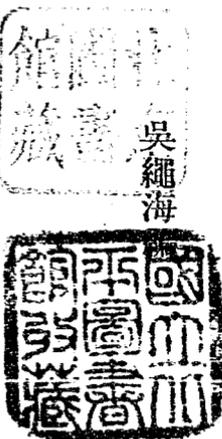
附記

日本近世文化與中國

第一章 序論

提起日本的文化，大概誰都即刻會聯想到「模倣」這兩字罷。日本的文化史確是一部模倣之文化史。日本古時固不必說，一直到現今爲止，尙且不能完全擺脫模倣的境地。自古代到明治維新前爲止，不待言，所模倣者完全是中國的文化，從明治維新這一個「大翻身」的時代起，才是歐化主義全盛，大自國家政治，經濟，學術，小至日常的衣食住等等方面，無一不是醉心歐化。五六十年来出現了這樣一個現代之新日本來。但是這裏有一件極可注意的事：就是日本在模倣歐化的初期，各種文物無一不是由中國間接傳去的。當時的現象若是不從中國，換句話說就是若不讀中國翻譯的外國書。簡單是無法去接觸西洋的文明。簡直有點像今日中國的現狀一樣，自日本的書籍中，很簡易地吸收一些西洋的文明。

日本人的善於模倣，並不祇是被以老前輩自居的中國人稱道，就是現代的日本所模



做的西洋諸國也無不孰知。所以 Japan 這一個固有名詞在俚語中，已經可以變爲動詞作「模倣」講了。

在這篇文字中所要討論的就是近代日本文化史範圍中的學術政治各方面所受的中國的影響。日本的近代史確是一個最重要的時期，它所受的中國的影響如何，無一不是直接關係到後來的「明治維新」。在明治維新時代中，還受着不少的中國文化的勢力，這更加是和它國力膨大的現代史上有了不可分離的關係了。此處所稱的日本的近代，是以中國的明末清初起到清季爲止的二百數十年爲範圍。而且中國的文化在清朝確是出現了宋，元明以來所未有的黃金時期，從這一點上看來，日本模倣而臻至今日的現狀決非偶然。

在未敘述本題之前，日本自古以來所受的中國影響，亦有擇其大者一瞥的必要。

日本古代的中國文化的傳播約列舉如下：

一、晉武帝六年，百濟王仁攜論語，千字文（漢魏錄所作者）至日本，於是日本纔識漢字，而有所謂的「漢學」了。同時，在這時代（第三世紀的後半）的前後，中國有多數的移民至日本，在日本和中國的文化接觸上是有絕大意義的。

二、第六世紀中葉（南北朝後期），中國的佛教由朝鮮傳入日本，成爲當時日本的新思想了。

三、第七世紀的初年（隋及唐初），六朝藝術傳入日本。

四、第八世紀，唐的政治，制度，宗教，藝術各方面，俱傳入日本，出現了日本空前的文化燦爛時代。

五、第十二三世紀之間，宋的文化傳入日本，同時佛教中中國特別發葉的禪宗，亦以非常大的勢力輸入，在日本佛教中出現了絕大的勢力一直到今日。

六、第十四世紀初葉時，（元朝初年），宋學傳入日本，又成爲當時的新說了。

七、第十七世紀初年，明朝之制度文物傳入日本；同時陽明學派又成爲當時日本的新思想了。

以上這樣的一瞥下來，這些外來文化無一不是對於當時的各時代成爲一個新的刺激，在各時代的文化史中無一不有劃時代的價值。外來文化輸入日本時，自來雖有一些國粹主義者的反對等等，但是足以誇稱爲純粹日本文化的東西，可以說是貧乏到了極點，

所以結果仍是不能阻止屢次襲來的外來文化的大潮。雖然經過了很長的歷史，事實上得外來的文化添加了一些「日本性」，但是本質上沒有一件事能擺脫了佛教，儒教的影響而發展出純日本的文化來。在旅行日本的西洋人中，每每喜歡硬要在日本發現出「純日本」的文化，於是不得不指京都，奈良等處的寺廟爲「日本的」，這實在是已忘了佛教本身原不是「日本的」了。若我們中國人旅行到日本去時，真不容易發現出什麼所謂「日本的」來了。

中國文化這樣的屢次傳入的結果，對日本的文化的進展上莫不成爲最大的原動力，造成了一個足以容納後來的外來思想的準備時代。日本在清朝以前所受中國文化的影響是略如上述，那麼，自清朝成立以來，日本所受中國各方面的影響是如何呢？這就是在本篇中所要討論的了。

日本對於模倣外來的文化也有他們的解釋：就是所謂的「採長補短」，「順應同化」，「攝取吸收」等等動聽的名詞。這些字面雖不同，但是意義可以說是一樣的。日本自古以來模倣外來的文化，雖然能將本來的精華美點使之發展乃至進化，一面和固有的「日本性」融合；但一方面仍是每每陷入極端崇拜外國文化的弊病，一直到現代爲止，

仍是不改重視外國輸入品的心理。第八九世紀尊崇隋唐的文物的情形，在日本的歷史上是很顯然的事實。日本有名的行基和尙自稱日本人爲「東夷人」，在目蓮書等中自稱日本爲「粟邊散土」等等，均爲尊外卑內的一種實例。這種情形若善意的解釋，可以稱之爲「虛懷求益」，「採長補短」等等，惡意的解釋，不得不說是過度醉心外國文化了。

其次再看德川時代對清朝的文物的態度是如何？德川時代自第三代德川家光（一六二三——一六五〇）以後，就是所謂的「鎖國」時代了。但是實際上鎖國無非是對於一般的西洋諸國而言，對於中國仍是「開國」的態度的。因當時只對中國和荷蘭二國特許在長崎貿易，但當時普遍的思想，對中國稱爲「華」，對荷蘭則卑呼曰「夷」。這也是對中國尊爲特別的外國，對荷蘭無非是普通的外蕃罷了，所以凡是關於清朝的，俱稱爲「華人」，「華學」，「華館」，「華船」，對於荷蘭則稱爲「蠻人」，「蕃書」，「蠻館」，「蠻船」了。將中國尊爲「大國」，「上國」，這是日本自古以來就有的習慣，並不是自德川時代起才是這樣的。只不過德川時代是一個格外尊崇中國的時代罷了。其理由當然是自古以來俱受了大陸文化的感化和影響，尊敬外國的思想格外濃厚，幾乎成

爲國民性的一部份了。

而且日本自十四世紀中葉以後，戰亂繼續至二百年之久，人民當然是渴望着和平。在日本內地不能滿足他們的希望，對於外國文化當然是起了不能抑止的憧憬之念了。正在這時期中清朝入主中國，特別是康熙，乾隆時代，中國出現了全盛時期，日本國內的學者，對於自古以來就吸收的中國文化，在這時候由滿足他們的渴望上說，繼續輸入中國文化的這一件事，早已有了精神上的服從，當然是最有効，而且便利的了。於是一時之間，模倣的情形以致於將固有名詞的姓名，地名，也盡改成中國式的了。德川時代以前，這種風氣在儒學者中最甚，不將自己的本姓改爲中國姓者，當時不過三數人而已。平素以道學自命的中村惕齋亦改姓中，文學中的巨擘荻生徂徠，亦被一般的潮流所動，將本姓的物部改爲物，於是物徂徠之名大行於當時。而且他的門下，服部南郭改名爲服子燾，安藤東野改爲滕東璧，平野精華改名爲平子和等等，純粹像一個中國人了。地名的改變例如稱京都爲洛陽，甚至於改武藏爲武昌，東海道爲長安道，相模川爲湘水，和泉爲酒泉郡，目黑爲灑山等等無意義的模倣。

德川時代以後的儒者對於中國文化的尊崇更甚了。每遇有中國人到日本時。則對之

乞求書畫，詩文等等，又或者托中國商船將他們所作的詩文帶至中國請和。偶然得着一紙回音，真所謂視若拱璧，自視爲非常的名譽了。例如長崎的詩人渡邊陽谷，因本姓高階故改姓爲高名彥，又稱高陽谷，因這樣的盲目的尊崇，以致受了清朝商人的欺騙，成爲後世的一個笑柄。當然例外是有的，不過當時到日本的中國人，貨利的商人是占多數，真正的文人高士是非常之少。所以當時的不加一些擇別，只知盲目崇拜中國人真是一件憾事。當時鼎鼎大名見識高邁的儒者新井白石，尙且是以得着清人的文字自喜不已，何況其他了。再如「大明」，「大清」等本是中國自己的尊稱，又或者是對蕃屬國所用的稱呼，但是新井白石對朝鮮使者亦居然稱「大明」，「大清」，毫不以爲是一種屈辱。不止於此，而且他傾倒於中國文化之後，大有中國民族優於日本民族的口吻。又如研究天文，測量，航海術等新知識的本多利明，亦不能越出尊崇中國的時代精神。至於崇拜中國的皇帝康熙，雍正，乾隆的情形，更是不一而足了。

此外，德川時代的日本人，不願遠路交通的不便，均以能夠到長崎和商人階級的中國人面晤乃至筆談，其名譽是不下於今日出洋留學樣的。即使不能到長崎的人，若偶然遇着漂流到東海方面去的中國人，亦是足以誇耀爲無上的倖運和名譽的。例如江戶（現

今的東京的儒者東龜年正就是這樣的一個人。乾隆四十五年有一隻南京的商船漂流到日本的房州時，龜年和同志到房州去筆談終日，自譽爲遇着華夏人了，大喜，作文稱爲「真千載一遇」。日本這樣的尊重中國，以致於影響到當時長崎的奉行（警察）每每有所謂「損失國體」的事情發生。當時還有這樣的一個笑話，江戶的某儒者由日本橋遷居至品川，以爲是和中國已接近了一里路，居然是引以爲一件可喜的事。日本人當時這樣的心理，可以說是普遍的，例如同在一國中的人民，東部奧羽地方的佛教徒，無不羨慕西部九州地方的住民，因爲他們和天竺的彌陀淨土是比較接近了數百里了。而且當時的儒者中，因爲朝鮮是和中華文明的中國大陸接壤的關係，所以連朝鮮人也是被他們羨慕的了，當時日本對朝鮮曾有「小中華」的尊稱。

總之德川時代的尊重中國文化乃至中國人，和現在尊重西洋文化，乃至西洋人的情形實在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的。以上所略述的情形已可窺見一個大概。所以有一部份的學者當然要不勝其慨嘆乃至反對的了。但是中國的文化絲毫不因少數人的反對而停止輸入到日本去，因此所感受到的影響當然是在我們想像之上了。何況清朝是中國歷史上宋，元，明以來最隆盛而文物最發達的時期，又何況所謂德川的鎖國，並不是絕對的，就如

禁書這一件事，也是從十八世紀初期以後，除所謂的「邪法教化」的書籍之外不禁，醫藥，科學書更是盡量吸收的了。而且真正厲行鎖國的時期，也不過是最初的一百年間，以後的一百年間，是所謂「鎖國不厲行」時代，換句話，也可以說是「開國準備時代」。當時雖是很遲緩而且少量的，但是一般人對於所卑視的西洋文物也逐漸輸入了。那麼，對於向來所尊重的中華的文物的傳入，其影響之大是毫不足怪的了。日本人特別是文人尊視中國的心理不祇是德川時代，就是明治時代中亦還如此，例如信夫怨軒憤慨當時的日本文人，他所寫的「權清國辯髮奴如虎，尊之如孔孟」的情形，足以想見當時情形的一斑了。

第二章 本論

第一節 儒學——特別關於考證學風

近世日本所受的中國影響最大者當然是學術方面了。而尤其儒學（漢學）為最甚。中國的學術當然是各時代均有它的特色，例如兩漢的記誦，訓詁，六朝的清談，詞章，唐

朝的詩，文，宋朝的性理學等俱各發揮了它的特異的進步。明清以後一直到近代中國，却是精於編纂及考據，特別是考據造成了空前的考證學。再看近世日本德川時代的學風，十七世紀初年以後的七十年第一期中，信奉的不過是程、朱、陸、王的學說。而且當時的學風是不但不分經學與詩文爲二途，就是詩和文亦尚未專一。在這期間中，當然要以明末遺士朱舜水（之瑜）的渡日這一件事影響爲最大了。舜水雖不是清時人，但是他的渡日是在順治十六年（一六五九年），而且他的渡日完全是爲明亡的關係，一直老死在日本，他的墓也在東京，似乎是在去年，日本人還開會紀念這一個外來的偉人，他對日本的影響的重大也就可想而知了。舜水對於日本儒學界的貢獻可略分如下數端：

- 一、爲水戶藩主德川光圀的先生，開發所謂水戶學風。
- 二、安清澹泊出其門下，開水戶修史之運。
- 三、定大義名分使人心有所歸向。
- 四、山鹿素行，木下順庵等俱受教於舜水。
- 五、建築聖堂。
- 六、遺有舜水文集，舜水談綺等著述影響於當時及後世。

由上面這數點看來，朱舜水所給日本感化最大的當然是除學術之外，還有所謂名教方面的。

和朱舜水同年渡日的還有陳元贊。元贊不但確立了日本的「柔道」，而且對於詩學亦有不小的功勞。（關於元贊的事蹟後節詳述）除朱，陳二氏外，明末清初渡日的當然不少，但其影響亦均屬於宗教、醫藥、美術等各方面的，本節中先專就考證學風討論。

二、

德川時代流行考證學風，已是在中葉以後的事了，現略述其初期的學風情形。德川時代初期的七八十年中（一六〇三年——一六八〇），所信奉的只是宋儒，到最後因伊藤仁齋，物徂徠二氏開始獨創的研究，才成爲思想獨立的先驅。直到貝原益軒的大疑論，出現後，才漸次不盲從宋儒的學說，日本的學界方稍現生氣。這算是第一期。此後的七十年（約一六八〇——一七五〇）算爲第二期。在這時期中因將軍德川綱吉好文崇儒，獎勵文教，於是儒學在這一個時期有了相當的發展。其次就是一七五一——一八三〇的八十年爲第三期。在這第三期的初年，前期的老儒碩學俱凋落殆盡，但新的足以稱霸一時又未出現，所以在這期間中，諸學派的末流互相辯難傾軋，各立黨派門戶，於是儒

學中若欲新樹一個旗幟，當然是非開一個新的學風出來不可的了。在這時候以態度公平相標榜而出現的就是所謂的「折衷學派」。這完全是諸派互相傾軋的一個反動，但同時又成爲考證學風的先驅。但是折衷乃至考證學的萌芽已經在上述的第二期中發生了。例如伊藤東涯（仁齋之子）和前舉的新井白石，物徂徠等人的學說已具備得有折衷學乃至考證學的特徵。第三期中的片山兼山，井上金峨等人完全是以折衷學作他們的特長。例如關於兼山的學問的紀述是：「近古唯一之考證家，受清朝諸大家之影響，一洗元祿，享保時代（一六八八——一七三五）學說之誤謬，自爲一家之學。」

總之這樣的考證學風的流行的一大原因完全是中國的船舶到長崎的日見增多，近代清人關於考證學風的著述亦因之輸入的關係。又如在一七七二——一七八八年間首唱考證學有名的吉田篁墩（井上金峨的門下）也可以看得出除考證學之外，校勘學以及尊重古鈔影本的學風也在這時候開始了。這些事無一不是受了清朝特有的學風所感化影響的。自此以後，師承的儒學者相繼出現，但都是傾向於考證學風的。例如在吉田篁墩後三十五年出的太田錦城稱讚「得明人百卷不如清人一卷」。但是他的最大名著九經談的要點，亦無非是拾了一些清朝學者的糟粕。這完全是因當時中國最新的良好著述不易到日本

去；他却利用這一個一般人不易接觸中國新書的機會，將清人的意見作爲他自己的學說了。太田錦城的學說無非是抄襲一點顧炎武的日知錄，朱彝尊的經義考，毛奇齡的西河合集，趙翼的廿二史劄記，歐陽全等中的內容罷了。錦城的這種拾人餘唾的行爲，早就被當時的日本學者嘲笑攻擊過的了。但是在日本這類的學者却不止錦城一人，在他之前的太宰春台也是以經學妄自尊大的一人，後於太田錦城十年，學界又出了一個狩谷掖齋，但是他對於清朝的考證學風相當的忠實，而且研究的態度亦優於錦城。所以有人稱掖齋是日本考證學家之肇祖。有如喜多村香城稱掖齋是：「狩谷掖齋。松崎懔堂二學者出，始唱清朝考證之學，一變元明人無根空茫之說。稱掖齋和懔堂二人爲考證學的始唱者雖稍稍有不當之處，但他們二人均是熱心的考證學者却是無疑義的了。掖齋的著述經籍訪古志和本朝度量衡考都是在清朝學風影響之下的良好著作。而且他和清儒一樣的同時遠重視漢學。懔堂也是和掖齋同時的考證學者，以顧炎武的學說是尙。

在他二人之後，繼起的是豬飼敬所，朝川善庵，東條一堂三人，這三人是一八三〇年以後的第四期的考證學風的先輩。

這裏有一件足以注意的事實。就是中國和日本同一學風流行的年代的相差。這一件

事。一切中國所流行的學術文章無不經過了一百年乃至二百年後才傳入日本。在交通不便的當時本是應有的現象。例如上面所述的物徂徠的學術基礎的古文辭這一種學風是創始於明朝的李于麟，王元美，約一百五十年後才傳到日本。關於考證學風也是這樣。清初顧炎武，毛奇齡等首創考證學後，經過一百數十年至十八世紀末，日本才漸次流行。以上是第三期，其次的第四期是一八三〇——一八六七的約四十年。在這一期的初年，前期的諸大家均尚存在，而且又出了一些師事他們的後起之秀。對於漢學和考證學的發達上俱有了相當的功績。

在他們這一些師承的學者之外，日本近代史中最有名的學者賴山陽，他的特長雖不在考證，但是他關於清朝學術的著述却也有四五種。在這裏要附帶的說一句：就是日本也和中國一樣，說文學是和考證學同時並進，所以惠棟，戴東原，段玉裁的學說亦因之傳入，例如段玉裁的說文解字和康熙字典等均受了當時儒者的極大的讚美。不祇是當時的儒者如此，就如政治家的佐久間象山等人亦受了清儒的莫大的影響。

以上是將德川時代的儒者所受的清朝學術的影響略述一過。但是清朝的程朱學派的著述對於日本儒者的影響也不小。例如寬政年間（一七八九——一八〇〇）的三博士之

一尾藤二州就是對於清朝的陸隴其的學術特別愛好的一人。

上面大概是就人的方面將近世日本對清朝學術的關係略述了一過。其次再就書籍方面稍加一點說明。在長崎的中日貿易自德川時代起漸次進展，商船中當然也輸入了不少的中國書籍。此處除這些輸入書籍外，先就日本所翻刻的清朝學術書籍略加觀察。第一就是江戶的「昌平學」（聖堂）所翻的中國書籍自周代的起至清朝為止共為一百九十三部，其中清人的著述占四十部，為全體的五分之一以上。第二是諸藩侯中翻刻清人的著述。第三是江戶（東京），京都，大阪三府以及其他的書林，個人等的翻刻，其數目當不少，但是比較出板得多的却是經書以外的史學，文學，醫術等類的書籍。

德川時代的情形大致是盡於此，以後再一瞥明治時代的情形。明治時代漢儒中宜首推中村敬宇和島田篁村二人，後者對顧炎武特別欽慕，在他的古人評論中稱顧炎武是：「其勁氣峻節足以激貪儒而立鄙薄矣。其學以漢儒為門戶，以程朱為堂奧，自經史百氏典章制度，以至輿地金石聲韻之類，莫不包羅該貫。……總其大要，攷據精確，識見超邁，卓乎為明清羣儒之冠」（以上原文）。清朝晚年的儒家使明治時代的日本儒學者所景慕者以俞樾為最了。師事俞樾的井上陳政專崇他為：「驅逐許鄭，凌越顧闈」。當

時中國公使黎昌庶亦云：「日東人士無不知曲園者，每語中士耆彥，必首舉先生。客遊蘇滬省，亦必起居先生，蓋尊仰之，不啻泰山北斗云。曲園對明治時代儒者的影響由此亦可見一斑了。」

最後，中國清朝的學術和近世日本國民道德的影響亦似有一言的必要。清朝的著述中，六諭衍義（順治九年頒行）朱子家訓（清人宋用純，字致一，號柏廬所作者）乃至道教關係的太上戒篇等莫不在日本國內起了極大的影響。根據這三部書出了不少的翻刻乃至訓釋等等。對於其他清朝的學者的著述當然還有不少，例如清國立志篇這一部書，就是將清人的言行收輯起來，作為日本國民的修身的教訓的。就是六七十年的曾國藩的言行，亦足以為日本國民的修養的資料的。

清朝的考證學風在日本流行的情形大體上雖如上述，但是一方面並不是沒有批判考證學的缺點的人，例如賴山陽所謂的：「清人考據，率欲罵咒宋人，以樹己門戶，故實益人者甚少」，和太田君明所謂的：「然穿鑿叢脞，昧於大義」等俱是站在批判的立場的論調。

再者，清朝考證所影響到日本的學界的，不祇是儒學，就是日本的「國學」和小說

界中亦有了極大的勢力。國學者每每閱讀中國的書籍藉以增長見聞。顧炎武的日知錄等尤爲必讀之書。對於中國的大著康熙字典，佩文韻府，淵鑑類函等俱欲模倣，實際上，日本的羣書一覽就是模倣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的著作。小說界所受的清朝學的影響亦不小，最有名的德川時代小說家瀧澤馬琴爲最甚，因他的特別愛好中國的文物，所以他的小說亦每每是由中國的稗史小說中翻案過去的。他的有名的小說八犬傳是很明顯的由中國各種書籍中引用參考去的。（關於這一點，在次節詳述）

三、

中國的學術既然這樣有力的影響到日本的學界，經過了這樣長的時期，當然可以想像日本也有了相當的著述了。事實上也是這樣，日本學者的著述確是有一部份傳播到中國來了。在中國的學界中也引起了相當的注意。下列的數種書籍俱是曾經傳入中國或翻刻過的。

- 1 「論語徵」 物徂徠著 清錢冰之翻刻
- 2 「七經孟子考文並補遺」 山井鼎撰 荻生觀補遺
- 3 「論語皇侃義疏」 鮑廷博以之收入知不足齋叢書第七集

- 4 「尚書古文考」 山井鼎著 李邦元收入函志
- 5 「佚存叢書」 林述齋輯
- 6 「九經談」 錦城著
- 7 「藝苑日涉」 村濑榜亭著
- 8 「舜殿」 多紀桂山著 以上三書由江塚團傳至中國
- 9 「六藝論」 鹽谷宕陰著
- 10 「管子纂註」 安井息軒著
- 11 「左傳觀釋」 安井息軒著
- 12 「日本外史」 賴山陽著

其外還有在中國早已散佚的古書，在日本反能發現而再傳至中國的書籍亦有數種。這完全是中國戰亂頻仍不易保存古物的關係，所以反在日本往往能保存千年以上的古典。

- 1 「鄭注孝經」 收於知不足齋叢書第二十一集
- 2 「孝經孔安國傳」 收於前書之第一集
- 3 「羣書治要」 唐魏徵著 收於連移筠叢書

第二節 史學

清朝學術的特色首推考證，考證學所研究的對象最顯著的當然是歷史和說文學了。所以日本近世的史學亦因崇尚清朝考證學風的關係能夠有今日的進步發展。德川時代以來由中國輸入日本的書籍關於歷史這方面的非常之多。這些書籍不但在研究清朝的史實上，就是清朝以前的中國史乃至東洋史全體的研究上所引證參考的清朝人的歷史和地理方面的書籍真可以稱得汗牛充棟。而且不止是引證參考，歷史的敘述和研究的方法上亦完全受了清朝著作的影響，例如趙翼的二十二史劄記在日本最風行的，在十九世紀中葉就有了兩種翻刻本出現。即如前節述的日本學者賴山陽對於考證雖然稱爲「益人甚少」，但是於二十二史劄記却稱爲良著，而且他還對於王鳴盛的十七史商榷和錢大昕的二十
一史考異亦稱爲實用有益之書。其他的學者對趙著讚爲：「可謂著書之能事」，「雖謂史學千古一人可也」。此外所輸入的清朝史籍乃至在日本翻刻的可列舉如下：

1 「武功紀盛」 「四王合傳」 堤它山校閱，合刻出版

2 「蒼曝雜記」 善庵等三人校閱出版

- 3 「清名家史論抄」三卷 收輯顧炎武，錢大昕等清朝史家的史編而成。
- 4 「讀史管見」 黎綺女史李晚芳著，池內闕所翻刻
- 5 「讀史論略」 杜詒讓，唐桂註，石坂宗哲翻刻
- 6 「史記論文」 吳見思著 小田原侯大久保家藏板翻刻
- 7 「讀通鑑綱目條記」 李流來著 幕府聖堂官板
- 8 「通鑑學要」 姚培謙，張景星輯
- 9 「綱鑑易知錄」 吳乘權等撰
- 10 「二十二史言行略」 過元政撰
- 11 「崔史壁讀書」 崔述著 那珂通世博士校點史學會藏板發行

其他清人的關於史學的著述輸入日本而未翻刻，在日本起了相當的影響的書尚不少。清朝的史籍這樣的輸入日本，不但在研究歷史的本身得了極大的幫助，便利，就是關於史論乃至詩史方面的研究亦完全是得益於清人的著述的。

此外例如中國有清人吳懶庵的經史論存，於是日本的關義臣亦撰一部經史論存出來，又如中國有綱鑑易知錄的名著，於是日本的村山緯，永銀鉞撰清鑑易知錄，河津孫四

最後，一瞥和史學有密接關係的地理學所受的清朝學者的影響。胡渭的禹貢錐指，關若曠的四書釋地，宋翔鳳的四書釋地辨證，以及關於水經的清人的考證等著述，對於日本的地理學的進步上啓發之功不小。其他各專門方面的參考書，於民政的研究則有顧炎武的天下郡國利病書，兵事的評論則有顧祖禹的讀史方輿紀要，沿革圖的參考則有馬徵麟的歷代沿革地圖和呂翰的歷代事蹟圖，西域的考證則有乾隆勅撰的皇輿西域圖志和椿園七十一的西域聞見錄，物產的究研則有大清一統志和其他的府縣志類。以至關於朔北，滿州，朝鮮，琉球，臺灣等處的研究，亦非參考清人的著作不可。日本岸田吟香出版的中外方輿全圖的原圖是根據胡林翼等撰的大清一統輿地圖。再例如日本近世的大地理學者長久保赤水費了二十餘年著成的日本輿地路程全圖，雖然附加了不精確的經緯度，但是這圖還是以清朝出版的原圖為根據的。赤水後來的新製輿地全圖仍是根據清人的原圖。

第二節 文學

近世日本文學上所受的中國影響亦非常之大，約可列舉如次：

一、漢詩的詩風為明朝袁中郎的性靈調和李攀龍，王世貞的古文辭的影響所及，自

德川時代傳入日本。前者爲深草元政，後者爲物徂徠所模倣推崇，一時風靡全國。但是日本漢詩人中所論的神韻和格調二大詩風，完全是受了清儒的影響。神韻的理想雖起於宋朝的嚴羽，但是至清人王漁洋時方以文字表現。格調則完全是清人沈歸愚（德潛）所唱導的了。近世日本詩話的風行亦是受了袁枚的隨園詩話和趙翼的甌北詩話的影響而起的。日本人所著的詩話的種類一時不下二十餘種，但是這許多詩話的體裁無一不是模倣袁趙二氏的。此外王士禛的帶經堂詩話，沈德潛的說詩醉語，翁方綱的石湖詩話等亦爲一般人所參考愛誦。至於詩韻的研究，則捨康熙時。佩文韻府外莫屬了。最後，日本的詠物詩的發達，亦完全是受了佩文齋詠物詩選，清人詠物詩鈔，古今詠物詩選，花歷百詠等清人的詠物詩集的影響，才放棄了自來以中國古事爲題的主旨，漸次對本國日本的事物故事等作爲詩料的。

二、日本儒者論文法的幾乎無一人不參考毛釋黃，袁子才，徐枋，徐文駒，邵青門，姚鼐等諸清儒的學說。吳乘權的古文觀止，吳仲倫的初月樓文話等著俱有了翻刻本。文評也是這樣無一不是參考清儒的著述而成的。

清儒所編纂的古人的文章如沈德潛的宋唐八大家讀本在十八世紀末年傳入日本之後

官私的鑿塾之中無不採用爲教科書，翻刻本不下二十種云。此外如蔡方炳的唐宋八大家文選，儲欣的唐宋八大家類選，呂晚村的唐宋八大家精選等亦於日本風行甚廣。於是繼起的以「日本」，「今古」，「近世」，「明治」等爲書名的八大家文讀本諸種類的書無一不是模倣沈德潛的原本而成的。

三、中國近世的小說，戲曲方面對日本亦有重大的關係。清朝著述的小說，戲曲的書籍傳入日本的當然非常之多。其中曹雪芹的紅樓夢，金聖嘆批的水滸傳。孔云亭的桃花扇傳奇，楊笠湖的哈風閣詞曲，墨浪子的西湖佳話，張潮 虞初新志，張應諭的杜編新書等爲最有名。而且俱曾經翻刻，翻譯，翻案乃至梗概的說明等普及於日本一般民間，其影響當在不小。其中尤以水滸傳的翻案，流行爲最甚。甚至笑林廣記，笑府，開口新話等類的書亦在日本有刊行的。至於鴻濛陳人所編的日本赤穗義士的故事海外奇譚（一名忠臣庫）在德川時代已有了兩種翻刻本。日本近世最有名的小說家瀧澤馬琴是以愛好中國的文物著稱的，他的最有名的小說八犬傳是翻案參考明清的小說的，還有他的金魚傳亦是翻案清朝的通俗金瓶傳的。此外如村田翁的筑志物語無非將今古奇觀中的蔡小姐忍辱報讎這一篇翻案成日本故事的。上述瀧澤馬琴因爲特別愛好中國文物的關係，以

致在他的小說中亦時常喜歡用中國的俗語。如「閑話休題」，「話說甚麼」，「題了開話再說」，「案下某生再說」，「當下」，「驀地」，「出像」，「尷尬兒」等字句。

總之不但是小說的趣向和文字的巧妙上模倣清人，就是關於小說家所應有的思想態度，小說戲曲的文學上的價值等亦莫不受了清人的影響。這樣的人當然不止馬琴一人，德川時代以後以至最近世的文學家中有不少是受了清人的感化的。

再一瞥日本的小說戲曲的材料是由中國所取去的，例如近松門左衛門的國姓爺合戰是取守台灣的鄭成功的故事的。

最後，西洋的小說亦可以說是由清人的翻譯始傳入日本的。例如伊索寓言這一書就是如此，最初是由漢譯傳至日本普及於一般民間。漢譯伊索寓言傳入日本者約可列舉如下數種：

- 1 伊索善喻言 香港英華書院印刻，同治元年刊
- 2 漢譯伊蘇善譚
- 3 翻譯伊索善喻言
- 4 (北京官話) 伊蘇善喻言

趙翼，蔣心餘，錢枚齋。姚姬傳等。

其次略述明治時代的情形。在這時代中中國已是成爲一個積弱的老大國了，國勢雖已不如以前的殷盛，但是德川時代以來風行的漢詩文的餘韻尚不因之減低。而且在德川時代所禁止海外航行亦在明治時廢止，一時公私之間來遊中國的文人非常之多，因之直接和中國的文人學士，山水都邑接觸，較前代所得者更大。其次就是中國方面派來的公使，如何如璋（光緒三年），張斯桂（同上副使）黎庶昌（光緒八年和十三年二次），徐承祖（光緒十一年），李經芳（光緒十七年），等人俱在外交公務之暇不廢文雅的私事。其間參贊，領事以及遊歷視察的人中當然仍有不少文人風度的在內。

此外私遊的文人墨客以及以語學爲教職渡日的人亦不少，例如黃遵憲，沈文英，姚文棟，傅雲龍，黃超曾，吳大徵，王韜等。比較近代的則有吳汝綸，康有爲，梁啓超等。上舉這些公私人等中，尤以何，黎二公使最爲著稱。無論關於經學，文字，詩詞等，往來於公署私邸之間者殆無虛日云。即如中國近代史學中有名的武將北洋水師提督丁汝昌往遊日本時亦以詩酒和日人相酬唱。這些事實無一不是對於日本的詩文上有了極大的

力量。明治詩壇的巨匠森槐南之能詩名頓高者，完全是他的詩受了王韜的推獎而起的。這類的韻事不獨東京是如此，就是日本各地方的文人也盡量和去游歷的倩人相交結。何黎二公使的著述在日本亦有相當的裨益。何如璋的使東雜詠，黎庶昌的古逸叢書在中日二國俱被重視的。其他如中國近世史中極有文名的王韜，在日本的聲望傾動全國，可稱是前後無出其右的了。他的扶桑游記，蘅華館詩錄，弢園尺牘，同續，遜窟瀾言等大行於日本。此外如傅雲龍的日本圖經，黃遵憲的日本國誌，日本雜事詩，葉焯的夢鷗曠等亦無不在日本占有相當的地位。

就是日本中人的詩文集等，亦無不以經過清人的題辭，序跋，評點，校閱為滿足，例如日本的經史論存，是以全部經過上述的何如璋等七人的評閱誇稱於一時的。其他如日本文章軌範，日本八家文讀本亦莫不如是。至於文章添削規範是日本大儒賴山陽，中村惕齋的文章經過張斯桂，王韜，沈文燮的校改的。

此外，雖未到過日本但是在文學中有極大的感化影響的就是前述的俞曲園了。繆荃孫撰的續碑傳集中稱當時曲園對日本的影響是：「晚年足跡不出江浙，聲名溢於海內。遠及日本，文士有來執業門下。其不及者，則從海舶寄書質證，賦詩相祝」。曲園又替

日本選定東瀛詩選，成爲日本詩集之始。政治家中如曾國藩的曾文正公文鈔，鳴原堂論文，在光緒時代的則有光緒名臣文粹，又編同治光緒時代的政論爲清籟，主津新集等俱在明治年間先後刊行。

最後，舉一個很有趣的例子以結此節。在序論最後所引用的信夫怒軒所稱的「權清國辮髮如奴虎，尊之如孔孟」的情形，但是笑罵明治文人的態度的怒軒本身，在呈清人駱鈞的書中，仍是這樣的卑下自己的身分：「日本信夫粲再拜大清國駱先生臺下。謬污電囑，推獎之隆，賜以高文，曷敢當……：僕小邦腐儒，今乃得臺下之高文，以取信於天下，喜出望外」。(以下原文)

第四節 文字言語學及「唐音清語」

日本德川時代以來盛行的清朝學術，當然是以經學攷證爲其中堅，但是欲求經義起始，非研究文學不可。於是訓詁，音韻，校勘，金石四學派相繼發生，這類清朝特有的文字語言學的分派，亦照樣的傳入了日本。在德川時代對於說文學的研究已有狩谷等人稍加研究，已略述於第一節中。校勘學亦同時爲狩谷，松崎所注意，阮元的積古齋鐘鼎

彝器款識的金石古文字學的傳入日本，已是在明治時代了。繼之又有吳大澂的古籀補，足以補段玉裁的說文研究的不足，亦傳入日本。在德川時代所輸入的關於這方面的研究材料尙形缺少，但在明治以後，說文書類的輸入頓見增加，所以這方面的研究更進步。日本的「說文會」是由重野安繹創設，百餘年來一直繼續到今日。

關於文字學方面的書籍傳播最廣的是段玉裁的說文解字注和張玉書等奉勅撰修的康熙字典。而尤其後者，在日本有十數種以上的翻刻。此外還刊行了康熙字典考異正誤（渡邊知新撰）和康熙字典等韻指示（飯島道實著）。

其次近世日本所受的清朝語學上的利益有張明德著的虛字註釋備考和張儒珍與美國人高第不同著的大清文典（原名文學書官話，'Mandarin Grammar'）。後者是日本得西洋方法研究中國文典知識之始。日本所出的支那文典就是此書的翻譯。又如模倣西洋文典的馬氏文通在日本也是關於中國語學的新知識之一。此外德川時代對於滿洲語亦已有相當的注意。例如清文鑑，清文典要，清文彙書，清文啓蒙，清漢文海等俱傳入日本。高橋景保還著得有清文鑑名物語抄以及選唐通事八人學習滿洲語的事實。不但是儒學者，當時的洋學者例如佐久間象山亦是非常注意清朝所發達的音韻學的一人。他有編成

國人完全無二，所以傍觀者雖見其服裝不同，亦不能辨別其爲日本人云。

當時不但實用的通譯，乃至讀中國的小說如水滸傳等亦流行用中國音，中國話。就是學術上也有人唱導用中國音學習。上面屢次提起的物徂徠就是這樣的一人，他主張讀中國文時廢止「和訓迴環讀法」，用中國音直讀方是學術上合理有功的方法。他稱這種讀法爲：「華音直讀之法」，或又稱：「長崎樣之學問，或「長崎流」，「崎陽之學」等。而且他還從上述的岡島冠山學習中國話。

關於中國文的讀法這一件事，在現在的日本尙是極可注意的，日本現在自中學乃至大學俱有所謂「漢文的功課。但是他們的讀法就是上面所謂的迴環讀法，乃是將一句文字顛倒改成日本的文法後誦讀，其發音當然也完全是日本的，所以他們雖能了解意義，但是不能發音。讀外國文字成爲這樣一種畸形方法，不得不說是事倍功半的了。所以當時的物徂徠主張獎勵真正的中國文讀法，不得不說是具有極大的見識。

當時學習唐音的不止是個人，有結成團體共同研究的。例如物徂徠的「譯社」，長崎唐通事的子弟們成立的「唐韻勤學會」等。在這樣的風行的情形之下文人學者亦有不少學習中國話的了。

，日常用語中不下數萬個漢語，這些漢語中一部份仍是保存着中國原來的讀的音。這些漢語的傳去約可分三個時期。一、隋唐時代，二、宋時代，三、明末清初時代。這三個時代中，有一個極應注意的特徵。就是第一第二時代大概是由日本所派的使節，僧侶，留學生等至中國，將中國的文物吸收回去，第三個時代却正相反，是由中國方面的商賈，僧侶，學者等到日本時將中國的文物帶了去。若將這些來往的人的素質上比較一下，當然自由日本派來的人俱是國內第一流的學者，由中國去的人却是商賈占最多數，有學識的學者僧侶爲數極少。而且在第三個時代中，正值幕府鎖國時代，即使能互相交際也是往往在某一種的規則干涉限制之下的，照理想來，第三時代中漢語的普及應較前兩時代爲小，但是事實上却正相反，這完全可以用清朝文化已是發展到了極點，日本國內尙無足以抗衡的文化發生這一個理由來解釋。

第五節 美術

第一 繪畫

近世日本繪畫上所受的中國的影響感化，可分爲二大種類。第一是到日本去的畫家

，模倣他所揮毫的作品的筆致等等。第二是中國的畫論和畫譜的輸入日本，由這些書籍中研究臨摹等等。

茲略述前者。清朝曾經到過日本的畫家由書籍上可考者不下二百人，這數目實不可謂少了。在這些人到日本之前，日本並不是沒有中國繪畫的影響，只不過自古以來的宋元畫風漸次的「日本化」，久已不存本來的真髓了。明末清初以來的這些人的渡日，可以說是有了一個更正的機會。渡日畫家中最早者首推順治元年的逸然和尚。其次是獨立，隱元，木庵，卽非，心越等諸高僧。這些人不但能書善畫而且將古書畫還帶去了不少。其次是朱舜水和陳元覽，這二人本不是畫家，繪畫不過是其餘技能了。其次就是陳清齋和高泉。這些人中尤其是以隱元等所攜去的書畫對於日本近世繪畫的進步上貢獻爲最大。這些畫俱珍藏在宇治的黃檗山廟中，供一般愛好者的觀感，黃檗山可以說是成爲當時的美術館了。以上是德川初期的情形。

德川中期渡日的畫家，最有名的就是伊孚九和沈南蘋二人了。以來日本的繪畫盡是北派，但是自伊孚九渡日之後，方知南宗山水的妙處。沈南蘋是花鳥寫生畫的名家，他的渡日正是日本畫壇中需要一種清新的畫風的時候，他投合在這樣的新機運之中，對於

如極端的尊崇中國的畫家，羨慕中國的山水，乃至作畫的水也有從西湖取去的可笑的事實。在香亭雅談中記得有這樣一段文字：「大村侯令唐商沈養山取杭州西湖水，越前人鳥山紫山得其餘瀝歸鄉。僧海音乞顏其半以貽予。此圖卽以其水所寫者也……尙有半勺餘滴，遺之圓山應舉，應舉以此又製一幅」。(以上原文)

第二 書

「書法」在中國自古以來不待言是視爲一種美術，日本的繪畫既受了中國這樣大的影響，「書道」當然不能例外。日本自古雖然模倣過中國的書法，但是不久之後俱流爲「俗書」，自十六世紀末年起雖稍有起色，但是所學的是朝鮮的書法，距真正的中國書法相去當然很遠。日人正式注意書道的時期，也是在明末清初中國的文人名士來往頻仍之後，而又是在宇治黃蘗山建寺，有許多中國高僧漸次去日之後的事情。前者爲朱舜水，陳元贊等，後者爲隱元，卽非，木庵，獨立，心越等。特別是心越最初將篆書傳至日本。此外至康熙初年的俞立德渡日後，日本的書道大體上也成立了一個系統了。日本人中亦出了若干的書家，但是其有一部份仍是入了日本籍的中國人子孫（日本稱爲歸化人）例如深見玄俗卽高天瀟爲高一覽之子，林道榮爲林公琰之子，北山道長爲馬榮宇之子，

趙陶齋爲清人趙某之子等。

明治時代將書道傳至日本者以楊守敬、余瓊二人最有名。楊以公使館員的資格到東京後成爲六朝書法傳至日本之始。余爲長崎領事是長崎方面六朝書法的創始者。楊編有楷法溯源和學書邇言二書，尤其以後者是被學書者尊爲金科玉律。最後，又如近年的康有爲不但政治上出名，他的廣藝舟雙楫亦是被日本一般所熟知的。

第三 文房具其他

書畫兩方面既然受了上述這樣的影響，和書畫有關係的文房具等當然亦以中國趣味的物品是尙了。

一、印章 書畫家的重視印章不待言是一件必然的事實。日本人關於印章技術的進步上，亦當然受了中國極大的影響。前條中述及的獨立和尙，不但在日本書道發達上有很大的貢獻，還帶去了不少石印，遺得有獨立禪師石印。心越和尙去日時又將陳策的韻府古篆彙刻帶去。自此以後，輸入了秋間戲鐵等等印譜，在日本的刻印技術的進步上俱占有了相當的地位。而且當時的人不在日本本國內的彫刻爲滿足，若能在中國定刻幾顆印回去，則更足以自豪了。當時封建時代事實上往往是以諸侯的身分纔能從中國定

刻六七顆印回去。此外黃蘗山的十五代第十八代的住持中國僧人大鴻著的印章篆說和原筮洲模倣清人著的印章備考出現後，日本纔產生了有名的刻印家大島芙蓉。這些事實無一不是自中國的影響中發生的。其他刻印的材料亦以中國輸入的爲貴。

明治年間亦不能脫離中國的影響。清人金嘉穗所首唱的「中鋒刀」刻法，和陳克恕的篆刻鑄度俱是在這時代的傳入日本的重要事實。

二、筆墨紙硯 日本自德川時代以前起，凡是學者，書畫等莫不以中國輸入的紙墨筆硯爲最上，因此同時日本本國所製造的亦莫不盡力模倣中國貨，漸次有了相當的進步，就是現在亦是如此，「日本畫」家仍非用中國的宣紙不可。當時雖然是國粹主義者例如鳥權園對於文房具仍是讚美中國貨不止的。

明治時代賞玩中國文房具的風氣仍不稍遜於前代。例如筆史（清梁同著）的翻刻就是最顯着的一例。

此外關於裝裝塌本亦莫不以中國式是尙。周嘉胄著的裝潢志就是在日本最有影響的一部著作。除所謂文房四寶的紙墨筆硯外，凡是書几，筆筒，墨斗，印斗，筆洗，水瓶；文鎮等均無不以中國輸入品爲最貴。

第六節 宗教

明末清初以來，日本所受的宗教上的影響雖較小於唐宋時代，但是由所謂的「歸化」中國僧新成立「黃蘗宗」這一件事看來，不得不研究它的影響了。日本「黃蘗宗」的開祖善提（魯大師）就是明朝末年由中國「歸化」去的第六十九世隱元隆琦禪師，以後黃蘗山的住持多為中國去的高僧。第一代的隱元外，第二代的木庵，第三代的獨知，第四代的獨湛，第五代中興的高泉，第六代的千呆，第七代的悅山，第八代的悅峯，第九代的靈源，第十代的旭如，第十一代的獨文，第十二代的杲堂，第十三代的竺庵，第十四代及十八代的大鵬，第二十代的伯珣，第二十一代的大成等十五僧無一不是中國去的。一直到現在的住持仍是一中國僧云。這樣的屢代的住持大半為中國僧侶所佔，其對日本的宗教上影響之大亦可想而知了。

長崎還有三個有名的中國寺廟，即興福寺，（明朝天啓三年建立，開山僧為眞圓，通稱南京寺），崇福寺（明朝崇禎二年建立，開山僧為超然，通稱福州寺），福濟寺（崇禎元年建立，開山僧為覺海，通稱漳州寺）。此三寺及其附屬小寺均以黃蘗山的萬福

謂的「野間權現」，「野間」二字讀如「Yama」，這是由中國所稱的「嫗媽」音譯去的。「嫗媽」即「天妃」的別稱，又稱「娘媽」。其次是長崎地方有所謂「聖靈祭」，以及重喪祭之禮，哭死者之禮等俱是受了中國的影響而發生的。最後，陰騭文的因果報應的信仰在日本亦相當不淺。

第七節 醫術及博物學（附理化等科學）

第一 醫術

明末清初到日本去的醫者首推杭州人陳明德（入日本國籍後改名爲潁川人德）爲最著名。他著有心齋錄一書，實際醫術上是被稱爲國手曾受日本人的無上的尊崇的。以後去日的爲王寧宇，先住長崎後往東京，一時從其學者甚衆。在這二人之後，順治十年去日的戴笠宇（曼公即僧獨立）在醫學上的貢獻較前二人更大。笠宇是前述的僧侶隱元的徒弟，他既是書家又善於印刻，但是在日本盡力最大的當推醫道。池由正直，高玄岱等有名的人俱是他醫學門下的高足。特別是池田正直得他直傳生理及病理圖七種及醫書六部九卷。特別是痘科鍵一書是曼公醫道最得意之處。（痘科鍵的淵源是來自魏廷賢的痘

刻的當然不少。對於痘科鍵的批評是：「宋元以來，痘科之書無慮數十家，未見出於是書者」。以外如劉松峯註釋的痘疫論類編是和內經，本草，傷寒論等同樣重視，成爲醫學上的教科書。

其次再一瞥關於治療上實際情形和清醫的關係。日本自古最苦惱的病症就是痘瘡。大槻磐溪的牛痘歌云：「人生有二患，麻疹與痘瘡。痘瘡最慘毒，十兒九天殤」。古來日本的醫家雖有過苦心的研究，但是至明末清初以來中國醫法傳入日本之後，其治療法纔大備。德川時代戴曼公的治療方法傳入日本的情形已略如上述。此外還有邱薰的引痘和引痘新法。種痘方法傳入日本的四十年前在中國已通行的了。中國的種痘方法傳入日本七八十年之後方有西洋的牛痘種苗的方法傳入日本。（西洋種痘是始於一七二一年，清康熙六十年）直至乾隆年間尚有關於種痘的醫書傳入日本。總之，日本自古的這一種難治的痘症因清醫的傳入得以解決，這一件事是非感謝近世的中國醫道不可的。

最後再略述間接由中國傳去的西洋醫術。在德川時代日本雖有一點西醫的萌芽，但其中仍少不了中國的影響。例如英國合信（Dr. Hobson）著的全體新論亦是以中國譯本傳至日本的。因爲當時日本不通西洋文字，若不經中國間接介紹，可以說是完全不得其

了不能停止藥材供給的關係。所以德川時代的諭告通例往往是禁止其他的物產，而不禁藥材，藥品的輸入。當時日本的藥材商盡是國內的巨商，大資本家才能經營的事業。

同時中國的藥品，藥劑傳至日本後，亦有許多被模倣製造的，例如龍腦丸，延齡丹，萬應解毒圓，茶膏，橄欖膏，大蒜膏，錦袋圓，乳酥等。

第二 博物學及理化等科學

在近世以前的日本，博物學是屬於醫學的一部份的，所以博物研究的盛衰均依醫學為消長。但是自近世以來，因和中國以及荷蘭接觸的關係，博物學的範圍亦自「本草學」而擴大了。現略述和中國方面的關係。明朝萬曆三十五年（一六〇七年）李時珍的本草綱目傳入日本，為日本研究博物學（本草學）的第一步。當時日本的本草學當然是非常的幼雅，所謂的本草學家只有中國人盧草頌和向井元升二人，而且向井亦是從長崎的中國人直接學的。以後又有一人阿部照任別為本草學中一派之祖，但是他因為風浪的關係偶然漂流至福建，於是就在福建住了十八年，專心研究本草學後歸國。所以他學問仍是不出中國本草學的範圍。當時對於航海這一件事是定為國禁的，所以阿部能夠這樣偶然到中國去研究了十八年歸去，不得不說是極大的幸運。這樣的情形之中又出現了一個

博物學家（本草學家）曾繁（其遠祖爲明人）。但是他的博物學完全是由中國間接傳去的。他利用他的地位，將所採集的數百科草木托琉球人每年帶七八十種至福建，北京等處，請當地的本草學家醫家鑑定之後，卽以其答覆編成質問本草一書，又著得有成形圖說，質問着色本草。此外關於本草學方面的書有呂宏昭藥品答，陳振先採藥錄（藥草功能書）等。關於本草學的實際研究則有江戸，和長崎地方的藥園（卽植物園）的經營。凡是日本所不產的有用動植物俱盡量的購求移植。

和本草綱目同樣的盛行於日本的還有陳扶搖的秘傳花鏡，這兩部書俱有了數種的翻刻及若干相類似名目的書出版。除這兩部書外，在日本曾經翻刻的本草書尙可以數出十餘部。

西洋的博物學亦和西洋醫學一樣的間接由中國傳入日本。第一仍是上述合信（Dr. Hobson）以中文著的博物新編。此書除所謂博物之外，還包含得有物理，天文，地文等。德川末年以來這部書在日本經過十數次的翻刻，解釋及補遺等，足可見得在當時之受重視了。其次就是美國丁睦良（Martin William）著的格物入門，英國韓廉臣（Will

anson) 著的格物探原和香港英華書院漢譯的智環啓蒙 (Graduated Reading Comprising a Circle of Knowledge) 等三書均有二種以上的翻刻本出現。

此外關於植物學則有英國韋廉臣於咸豐八年著的植物學；化學則有美國嘉約翰口譯清何瞭然筆述的化學初階，英國韋而司撰，傅蘭雅譯，清徐壽筆述的化學鑑原，礦物學則有美國代那撰，瑪高溫譯，清華衡芳筆述的金石識別，英國雷俠兒撰，同上二人譯述的地學淺釋，美國韋理哲著的地球說略等書俱有翻刻本出現。再如數學，天文，曆法等亦莫不然。利瑪竇 (Matthew Ricci) 的幾何原本，同文算指，渾蓋通憲圖說，勾股義等；陽瑪諾 (Emanuel Diez) 的天文略；南懷仁 (Verbiest) 的靈台儀象志，湯若望 (Adan Schall) 的渾天儀說，割圓八線表；明徐光啓的西洋新法曆書；清程卅祿的西洋算法大全；羅雅谷 (Gaeob Rho) 的崇禎曆書引；清人梅文鼎的曆算全書；游藝的天經或問；龐迪我 (Pantoja) 的七克；以及康熙時代勅撰的曆象考成等中西人士所著的書在日本俱各發生了獨特的影響。一直到德川時代以後乃至最近世仍是不能脫漢文書籍的幫助。例如，英國偉烈 (Wylie) 撰的數學啓蒙，英國棟糜甘 (De Morgan) 撰，偉烈亞力 (Wylie Alexander) 口譯的代數學等著俱是由漢文翻刻的。

第八節 由漢籍所得的西洋新知識

關於醫學，理化學以及博物學上的西洋新知識已略述於第七節中。本節中所記爲其他各方面。

最足注意者就是歷史和地理方面的知識。在學習西洋文字困難的德川時代欲知道西洋的歷史，地理，最便利而且唯一的方法就是利用在中國的西洋人的著述和翻譯了。這些學術上的著述乃至翻譯（大部份是由中國人筆述的）中當然有不少關於歷史，地理方面的新知識。例如美國裨治文（Bridgerian）撰述的聯邦志略，英國慕維廉（B. Williams）譯著的英國誌，地理全志，美國韋理哲著述的地球說略等四書均爲西洋人的譯著，在日本俱有過翻刻的。還有清人魏源所著海國圖志，徐繼畲的瀛環志略等書的內容亦均翻譯，採集西洋的說學而成。在日本亦同樣的有了數種翻刻本。以上六書俱爲德川時代輸入，翻刻的。在明治年間日本一般仍是不能直接閱讀西洋文字，所以漢譯的著作仍是同樣的輸入，翻刻。例如英國模禮菴（Morrison）著的古今萬國綱鑑錄，美國韋理哲著的地球說略譯解，美國林樂知，中國嚴良勳，李鳳苞原編的四裔年表等。再如前舉的

地理全志竟出了日文譯本。

其次關於政治，法律，經濟方面，亦得益於漢譯書籍不少。例如在日本曾經翻譯過的就有：美國丁賾良 (Martin William) 著的萬國公法，星軺指掌，美國鮑留雲編的致富新書，英國法思德原著，丁賾良譯的富國策。而尤其以萬國公法為最著，原刻在同治三年出版的第二年在日本就有了翻刻。日本近代的大政治家大隈重信，犬養毅等的新知識完全是由這部書養成的。富國策也是這樣，頗盛行於一般學者政治家之間。

其次就是新聞紙的發達亦不能無中國的影響。中國所發行的漢字新聞，例如六合叢報（咸豐七年發行於香港），海外新報（咸豐八年發行於寧波），香港新聞（不詳），遐邇貫珍（咸豐四年發行於香港英華書院）等均在日本有翻刻發行。日本後來在文久二年（同治元年）纔發行巴打維亞 (Batavia) 新聞和海外新聞別集二新聞。但是這二種新聞仍全是翻譯。前者是由爪哇 Batavia 的荷蘭字新聞，後者是由美國紐約的報紙中翻譯後用木活字出版的。

其次關於軍事上亦由漢籍得了不少新知識。例如普魯士國希理哈撰，英國傅蘭雅口譯，清華衡芳筆述的防解新論，王韜著的普法戰紀，英國白力蓋輯，博蘭雅口譯，清徐

總省刪述的器象顯真等書。關於航海的則有美國瑪高溫著的航海金針。

總之，如上述的情形看來德川時代以來的學者雖不能直接讀西洋的著作也可以吸收新知識了。直到明治時代還是這樣。

最後，再一瞥西洋諸國的「語學對於日本亦少不了中國的幫助。例如Lobscheid著的英華字典 (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 With Punti and Manderin Pronunciation, HongKong, 1866-69) 在日本發有了三種翻譯翻刻。此外還有德法增補英華字典 (一八六六年刊於香港) 以及英人穆理宋 (Morrison) 著的五車韻府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Shang hai and London, 1865)、華英文字合璧 (Chinese and English Phrases selected from Morrison 'S Dictionary, Shanghai 1879) 、Dooitte 著的英華萃林韻府 (Vocabulary and Handbook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Foochow 1872) 、華英辭典 (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 from W. H. Medhurst and other Author, Shanghai, 1879) 英人斯維爾維廉士著英華字典 (English and Chinese Vocabulary) 等書。當時日本不但這樣的非倚賴中國出版的字典不可，即使日本偶有字典出版，例如有名的英和辭書亦是由上海美華書院出版的。其他又

如大槻玄幹著的和音唐音對註西音發微西洋字原考是參考清文鑑及清文啓蒙等書而成。而且所用的音完全是「唐音」（中國音）。此外還有兩部中國人的著述亦傳入日本。一是鄭其照撰的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 Hongkong, 1875。一是清子卿著的增訂華英通語。又如明治以後對日本的英語發達上有極大貢獻的平文（Hepburn）著的英和英辭書的第一版亦是在上海印刷的。（A Japanese and English Dictionary, with an English and Japanese GudeX, Shanghai, 1869）

第九節 政治法律

德川時代的日本雖是鎖國時代，但總不能絕對的和四隣不相往來，何況對中國是自古以來任何方面俱無不受有絕大的感化影響的。當德川末年，外國船舶時至遼海巡弋，對世界的外交亦漸次感覺到必要。尤其是中國經過鴉片戰爭和西洋發生了密切的關係之後，日本自然更不能輕輕放過對西洋的關係了。鴉片戰後中國人的著述就是魏源的海國圖志。（鴉片戰後四年，即道光二十四年出版）。這部書本是鴉片戰爭史中最有名的林則徐的創意，魏源是根據他的感慨，西力東漸的可危而著成的。當時日本的國情也大概和

中國一樣，在西洋勢力的脅威之下，所以一般識者幾乎無不熟讀此書，對外觀念和外交知識的養成上得了極大的幫助。同時，魏源的另一名著聖武記亦在同樣的時勢之下受日本一般的歡迎。所以海國圖志有了前節所述的數種翻刻板出現。其次美人林樂知著的中西關緊論在日本亦有一種和刻本及抄譯。

關於一般政務方面，最初則有清朱佩章口答的清國探事。內容是關於政治，國防，禁令等。關於牧民，救荒方面則有黃六鴻的福惠全書，朱軾的廣惠編，乾隆時代勅撰的康濟錄等俱經過日本學者的訓譯或校正翻刻。此外王槐的錢穀備要，姚碧的荒政輯要，汪志伊的荒政輯要，顧炎武的天下郡國利病書等亦為農政救荒的良著盛行於日本賀長齡編輯的經世文編為實際政務的良好參考書，在日本有聚珍版的印行。

關於法律制度，日本在十八世紀初年就從事清會典的翻譯。但是這樣大著作的翻譯乃至解釋仍是非藉中國人的助力不能為功。

最後，即如檢屍這一件小事，亦是非依賴中國書籍不可，清版的洗冤錄（宋宋慈撰）和清人郎錦編的洗冤錄集證等俱為必讀之書。

以上德川時代的情形是如此，即在明治時代，關於刑名，分例等尚是參酌清律的。

例如由明治三年頒布的新律綱領，六年頒行的改定律例的來歷體裁中均可明瞭。其他如八年刊行的擬律心携，擬律照依表亦莫不如是。

附記：這一篇文字是以中山久四郎在史學雜誌（第二十五編第二號至第二十六編第二號）發表的「近世中國及於日本文化上之勢力及影響」中一部份為根據，參雜了一些自己的意見編譯而成。對於這篇文字的敘述方法上雖有若干不滿意處，而尤其是對於明治以後的敘述非常簡略，本想多參考一些書澈底的編一下，但是材料的收集一時不易辦到，在最近的將來一定非了此願心不可的。不過，我們看了這一篇文字後，至少，一個渾然的概念——日本在德川時代以來無事不模倣中國文化的概念——是可以把握住了吧。編者最後所說的一句話：日本因模倣中國的文化——固有的以至於西洋傳來的——而有今日的發達，被模倣的中國，今日反是無一非模倣日本不可了。文化史上的這一個大問題，是屬於文化本身呢？的中國？這確是我們學歷史的人所應研究的了。



日本政治制度

劉莊著

——日本研究會叢書之一——

此書於明治維新前後變法之經過，與近代憲法之創制，及議會內閣元老，樞密院之組織，詳述無遺，言簡意賅，堪稱佳構，而於軍部之權勢，尤三致意，允為今日研究日本政治者之唯一參考書。

——定價六角——

總發行所

南京將軍巷三十三號

日本研究會

代售處各大書坊

民國二十三年十二月十一日印刷
民國二十三年十二月十三日出版

編輯兼出版者

南京將軍巷33號
日本評論社

發行者

正 中 書 局
電話三一二六三
南京太平路

總批發處
印刷者

正 中 書 局
電話二二四六六
南京鼓樓
本期零售二角

訂購辦法	冊數	價目	郵費
零售	一冊	一角	一 分
半年預定	六冊	二元六角	二 角
全年預定	十二冊	四元八角	四 角
須知	二、郵票代現九折。		

國內及日本香港澳門一國外
歡迎直接向本局預訂。